



社会工作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划整理

边疆社会工作

BIANJIANG SHEHUI GONGZUO

李安宅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划整理

边疆社会工作

李安宅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疆社会工作/李安宅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5434 - 9518 - 0

I. ①边… II. ①李… III. ①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D63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2090号

书 名 边疆社会工作
作 者 李安宅
责任编辑 郝建东
装帧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050061)
印 制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4 - 9518 - 0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社会工作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思斌

副主任 杨 才 柳 拯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处辉 王瑞利 文 军 田毅鹏

史柏年 关信平 孙志丽 李迎生

张 辉 林顺利 顾东辉 徐永祥

高国忠 彭秀良 董 慧

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

（代序）

当今，我国的社会工作正在经历快速而复杂的发展，我们需要努力，需要探索，也需要回顾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过程。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社会工作学术文库》，将我国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学者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著作重新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次出版的有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朱亦松的《社会政策》。作为这一活动的参与者，我觉得此时应该表达一下对中国社会工作史的态度。

一、社会工作的历史品格

社会工作是一种面对现实，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本的实践和学科。但是，社会工作也有其历史性，也关注历史。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工作专业形成过程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来理解。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有较为复杂的发展历史。我们习惯于讲说美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历史，但是，看看美国学者对其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叙述，可以发现，那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甚至我们还难以说清楚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阶段和特征。如果考察一个复杂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我们同样要关注历史。这里的历史有两重含义：一是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有其历史背景，这使得社会工作者只能解决那一历史条件下的问题。二是在许多社会工作实践中历史是以持续性因素的形式出现的。不知道某一事件发展的历史过程，就难以找到合理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这些对当时问题的解决之道对当今来说也具有某种历史意义。那时解决问题的经验作为知识流传下来，对后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二、要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及进程

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也有其发展史，而这种发展史对于理解当今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依然有某种意义。我们一般认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直接起源是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受阻转而希望通过开办教育来培养人才的努力。这样，我国社会工作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知识和价值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西方人士启动的专业社会工作受到了中国参与者的影响并使其发生着某种符合中国国情、社情的改变。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并不是美国社会工作的照搬，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并不像美国那样盛行个案工作，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从事了很多社区工作实践。当然，这里也可能受到社会学的影响。我以为，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状况造就了那种社会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从较为宽泛的社会工作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多彩的社会工作谱系。从专业到不甚专业，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专业的社会工作，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我以为他们的方法和理念并不逊色于专业社会工作），一些爱国人士的赈灾救助实践，还有被某些学者称之为社会事业的实践，甚至包括乡村建设运动的某些实践。在这些不同类别的社会工作中，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看到历史的影响，那些当事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因素的理解，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历史脉络的影响。

既然社会工作是历史的，中国社会工作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社会工作史包括社会工作实践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史、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史和社会工作研究史，等等。我们不但要了解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史以及它的流派

和知识，而且要了解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和理论知识。但是，一个基本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工作教师和学生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工作的发展了解较少。这里有多重原因：第一，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较晚，研究成果并不甚丰富。从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后到40年代末，社会工作的成果并不丰厚。在政府那里，社会工作真正被承认是在40年代，这也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因为这段时间比较短。第二，社会工作被中断。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被中断，确实使社会工作元气大伤。民国时期本不充分的社会工作成果又被看做错误的东西而遭禁止，社会工作的许多书籍流散失落，学者们难以觅得。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浏览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藏书，确实并不丰富。但就是这些，许多学者也难窥其一斑。第三，社会工作知识的跨越式引进。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香港、美国引入了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而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知识形态。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题。第四，漠视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实践。既然社会工作已经有了西方的现代版，而西方的社会工作又被奉为正宗，所以在一些人那里，不看三四十年代的那些旧书也就是自然。

三、要读一些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著作

但是，我们仍然说，我们应该留意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历史，学习那个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某些较经典著作。我觉得这里有如下理由：第一，20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某些著述是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扛鼎之作，它们是那些在西方留学、学有所成并思考了中国实践的学者的著作，是他们的真正的研究心得。我们相信，这些著作对现在的社会工作师生和从业者来说是有意义的。第二，当时一些著作对社会工作方法和理论的介绍，今天看来可能相对落后一些，

但是它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却并非落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通过那个时代学者们对问题的思考，可以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通过比较当时的著述和今天的现实，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也能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这对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有识之士来说是重要的。第四，如果开展社会工作研究，读一些经典著作是十分有益的。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对本国社会工作经典阅读不多，读读这些精选出来的著作，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四、合作推进社会工作旧著重版和社会工作史研究

最后说一说我们出版这套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经典的具体缘由。第一，彭秀良的积极推动。彭秀良是一位有志推动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学者，虽然他不是大学的专职社会工作教师。他出版了《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梳理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又想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于是有了出版这套书的建议。他多次与我联系，我感觉到他的真诚和热情，很自然就有对他的建议的支持。第二，本人多年来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很感兴趣，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人比较关注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二是希望作一些对本土社会工作的研究。历史上我国学者的社会工作著作不多，就是其中较好者也未能成为社会工作教育和学术群体的共同读物，这会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基于此种理由，本人积极支持这套丛书的重印。第三，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积极组织。出版这套书是否能盈利，对于已走向市场的出版社来讲不得不考虑，但是在经过对推广学术和综合市场机会的考量，河北教育出版社还是决定出版这套丛书，这表现出该出版社对发展社会工作学科和事业的积极的学术精神。第四，各方同仁的协力支持。最重要的是那些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社会工作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初期就撰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流传于世。这些老一

辈社会工作学家、社会学家的后人，对重版这套丛书给予了无私支持。还有就是一些社会工作界、社会学界的同行学者，在挑选书籍、查找老一代学者后人以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表现出真诚的合作精神。

现在出版的这套《社会工作学术文库》，是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社会工作、社会政策领域学术研究的佼佼者。它们或是那个时代某一社会工作、社会政策领域较早的著作，或对我国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研究确有真知灼见。所以这套丛书可以带给我们知识、见解、洞察和责任。我们希望读者以尊重、欣赏、分析的眼光来看待这套丛书，并希望以此来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史、社会事业史、社会政策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文库》的出版对当今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比如，言心哲将社会工作看作现代社会事业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社会服务必须同时关注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才会更具效果。当今，从事民族社会工作的人士已经将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奉为经典。同样，蒋旨昂、朱亦松的著作对我国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发。

总的来说，是这个时代，是我国发展社会工作的大好形势促进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使有意者开卷有益，使求知者获得知识，使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思索者能有更宽的视野、更深的思考。

我们不能绕过历史。历史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厚实，更加自信，会使我们走得更远。让我们一起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

王思斌

2012年6月22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导 读

—

李安宅，字仁斋，笔名任责，1900年3月31日出生于河北省迁西县洒河桥白塔寨村一个书香世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据可考资料，他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学习刻苦勤奋。1923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24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班，1929年获得理学士学位及相当于硕士的社会服务职业证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工作，并被派到张家口苏联领事馆任英文秘书。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领事馆关闭，他返回燕京大学边教边读。毕业后留校，先后任社会学系、哲学系助教，国际研究所编译员等，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主要是民族学。

李安宅在婚姻上有过一段曲折经历。起初，李安宅奉父母之命与当地张家之女结了婚，婚后他把妻子带到北平，在平民学校读书。不久，他的妻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做平民教育的宣传组织工作。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女儿不到周岁时，妻子即死于肺病，李安宅把女儿送给了齐鲁大学的挚友、著名藏学家于道泉抚养。1930年，于道泉的妹妹于式玉从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回国，经哥哥介绍和李安宅相识并结婚，从此，二人带着共同的志向开始了人生的旅途。

1930年，北平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安宅的组织关系时断时续。1934年，他接受罗氏基金会奖学金，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留学深造，和组织完全失去联系。在美国留学期间，李安宅曾赴美国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从事印第安民族社会教育研究。这期间，他写出的《印第安祖尼的母系社会》常为国际同行专家所引证。1936年，他又到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并翻译了英国民族学家功能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和《两性社会学》，这两本书对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还编译了《巫术与语言》一书。1936年末，他回国在燕京大学执教，同时撰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论著数十篇在报刊发表。1938年，他将《社会学论集》集为一册由燕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据可考资料，1938年可以说是李安宅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始，此前出版的若干论著，多为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译著。1938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到甘肃拉卜楞进行藏区社会调查，一直待到1941年，创下中国人类学家在一地进行调查时间最长的纪录。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民族地区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李安宅也参与其中，对边疆民族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开展了实地调查研究。这次边疆服务活动，是由中国基督团体本着服务的立场开展的，除了辅助基督教“社会福音”传播与实践的意图外，也考虑到了促进边区社会文化建设和边地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养成。

1941年，李安宅被华西协合大学聘为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及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华西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受抗战影响，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均借居于此。其实，李安宅早在1934年就接到过华西大学的聘书。在拉卜楞时，华西大学来信说华西就地接近边民，应该负起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请李安宅为他们作计划，李安宅做了。他们要李安宅去执行。李安宅强调，边民工作应在民

族地区，不应在城市里坐在大楼上。与他办交涉的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建议他到成都与华大同仁见面，并寄了路费。李安宅便于1941年到成都，华西大学已任命他为社会学系主任。燕大在成都复校，梅贻宝约李安宅协助管理社会学系。李安宅无法离开成都，而其妻于式玉在拉卜楞也举步维艰，遂于1942年受聘于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等级是副教授，以后升为教授。李安宅不愿意放弃研究少数民族，便千方百计充实边疆研究所的工作。据胡鸿保在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类学史》介绍：李安宅除了在华西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外，还参与了多种社会活动，如为地方搞边政业务培训、为边疆服务做“最高顾问”，还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专程到川、甘、康、青等省考察边疆教育及边区政令推行情况。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及边疆研究所的众多学者，如冯汉骥、蒋旨昂、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都投入了对康藏地区（即今所谓藏彝走廊）的实地田野考察，产生了不少有分量的对边疆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成果，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

1943年1月，在理县政府赞助下，受李安宅指派，于式玉与社会学系副教授蒋旨昂等一同前往黑水地区调研，在麻窝住了将近一个月，有很大的收获。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蒋旨昂也是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研究者，他于1946年12月出版了《社会工作导论》，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早的社会工作导论教材。据云南省档案馆藏的1943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总部工作报告》所言，1943年，边部召开工作检讨会议，特邀李安宅夫妇参加。1945年，边部组织的凉山服务团由张伯怀亲任团长，3月初在华西坝开始训练工作。国内边疆问题学者如李安宅、徐益棠、柯象峰、刘恩兰、马

长寿、林耀华、冯汉骥、蒋旨昂等为主要训练导师，以地理、历史、经济及边疆社会工作等为主要训练课目，在结业典礼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应邀训话，成都华西坝各大学校长及关心边疆问题的社会学教授 20 余人参加了典礼，阵容非常强大。自边部在川康地区开展服务工作后，成都各大学研究边疆问题之学者，都以边部工作区为理想的边疆问题研究场所，工作人员利用实际服务之余暇，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与各大学或团体商定具体合作办法，其中与李安宅主持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的合作研究，范围最为广泛。据 1943 年 4 月《边疆服务》第 1 期《近讯一束》介绍，在成都的基督教五大学（华西、齐鲁、金陵、金陵女子、燕京）的社会学系，也先后与边部商定合作计划，对边疆问题作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在 1945 年 5 月《边疆服务通讯》第 2 期《研究工作指导》中有介绍：“李先生是本部委员，是边疆工作的真同志，更是边疆问题研究的权威，各地同工如有任何有关工作和研究的问题，都可直接向李先生请教。”在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中有介绍：李安宅主持的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乡村社会问题及训练大学生下乡工作起见，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在成都老南门外十二里的石羊场设立社会工作研习站，还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合作，在石羊场设立征属福利工作站，其工作有征属服务、托儿所、阅览室、诊所等。

李安宅作为边疆问题专家介入了边疆服务，这也促成了他对边疆及边疆社会工作的许多思考。作为一个学者，李安宅主要是在方法指导、业务培训及边疆研究等方面与边部合作的。他受邀担任边部辅导委员会和董事会委员，被聘为边部各种训练团导师，多次为边部工作人员宣讲边疆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还为边部撰写了多篇研究文章，发表在边部主办的《边疆服务》杂志上，对该部工作给予

了切实指导和大力鼓舞。李安宅曾在边部刊物《边疆服务》创刊号上在头条位置发表《论边疆服务》，对边疆服务的人才、工作、对象等若干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人才方面，用人至关重要，任期要长，考核要严，待遇要厚；选人则必要有吃苦耐劳的体魄与为人服务的精神，也要有一定“学识的造诣”，训练人才则要加强纪律训练和增加服务意识。李安宅在1943年4月《边疆服务》第1期《论边疆服务》中说：“服务对象即当地居住的人，‘一部分即训练出来为当地服务的人才’，‘助人使人自助’是‘一切服务人员最高的原则’。工作方面，目标是要‘引导边疆人民能为自己服务’；在服务方式上，‘一为从旁表证，一为从中策动’。”

李安宅治学严谨，一贯强调社会学应从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提出办法，而不应以政要的意志为转移，使学术符合政要的意志。所以，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因此而闻名。

1950年1月，为解放全国，中共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但是当时人们对西藏的了解非常少，贺龙向进驻西藏的十八军推荐了华西大学教授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李安宅夫妇多年从事边疆研究，并在藏区实地考察工作过，精通藏语，并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日语，是著名的社会学、藏学专家。李安宅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还是作家萧乾的引路人。据王先梅女士讲，李安宅虽曾两度在美国生活，但他毫无崇洋媚外之心理，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妻子于式玉对李安宅的爱国情怀也有过真实的评述，她说：“我的爱人李安宅是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他常对我讲：中国幅员极广，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只限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地带，而大片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却各方面都很落后，现在政府视若无睹，学校的知识分子都

愿意集中在大城市里，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可是处心积虑想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却不怕艰苦。日本人大批大批地前往内蒙古，英国人不断进入西藏去进行挑拨离间。我们自己的国土，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工作呢？”

1951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为发展藏族地区人民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创办了冬学，招收的学生不受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信仰的限制，后成立昌都小学，这所小学是全西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李安宅不仅管教学，连学生的生活、穿衣戴帽都管，对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也随时纠正。昌都小学成了昌都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文化中心，成了当地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新生力量。

1962年，李安宅在四川师范学院任副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据王先梅女士介绍，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安宅、于式玉夫妇被列为地主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根据是：为什么放弃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高位？为什么放弃燕京大学教授的职位而去艰苦的拉卜楞藏族地区为贫苦百姓服务？为什么放弃美国的优越生活而回到贫穷的中国？回国后为什么又削尖脑袋钻进军队到西藏？于式玉身患乳腺癌，在斗争的折磨下于1969年8月含冤去世。李安宅儿女不在身边，又患白内障至双目失明、肺炎、高度营养不良症，生活非常艰难，于1985年3月4日在成都去世。1987年，国务院和国家民委决定出版李安宅、于式玉教授的文集，1990年底文集已全部出齐。1995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妻在成都郊区大昭寺附近被重新安葬。

二

李安宅在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将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对中国当时的边疆政策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整合成《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边疆社会工作》是民国时期《社会行政丛书》当中的一部。这本书是李安宅在1939年夏离开北平去了香港、成都、兰州，最后到了拉卜楞藏民区，看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后，觉得有必要写出一本类似于《边疆工作手册》的书籍，一来进行边疆研究和服务，二来要加大边疆工作的宣传。后来在1941年，李安宅来到了成都华西大学，希望扩大边疆社会工作的宣传。恰好，在1942年2月，社会部发动编写“社会行政丛书”，遂将《边疆社会工作》列入其中。

著《边疆社会工作》有一定的原因。据李安宅所述，第一，他当时虽然在燕京大学有薪水，但是当时燕大的工作条件不好，所以李安宅也在寻找其他的研究途径。第二，希望此研究能引起当局的注意，从而弘扬当地的寺院文化。第三，想用知识来为社会服务。第四，由于李安宅夫人于式玉放弃了子女，放弃了报酬，来到当地学习藏语、藏文，并创办了女子小学，为李安宅提供了心理上和视野上的支持。另外，当时边疆内外交通非常困难，所以李安宅立志终身从事边疆工作，扩大同工范围，从而为边疆贡献力量。他也呼吁“青年人们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着重基层”。

《边疆社会工作》可以说是李安宅参与边疆研究和边疆服务的理论提升与经验总结，也是目前我们进行边疆服务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历史参考。李安宅以该书及一系列基于实地调查的论著，奠定了他在抗战时期中国应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他明确提出：“边疆地区的特点乃实地研究的乐园，尤其是应用人类学（边疆社会工作）的正式对象。”他认为要做好边疆工作，“不但根据实地经验，亦且依照

‘应用人类学’的通则。应用人类学即边疆社会工作学”。据可考材料,《边疆社会工作》这本书是李安宅“十余年人类学素养和三年藏民区实地研究的结晶,它是量少而质高的一种作品”,对“边疆社会工作或应用人类学”有着许多“特殊贡献之点”。这是窦季良在1945年2~3期的《边政公论》上发表的文章《读过〈边疆社会工作〉以后》中提到的。王先强在1946年第5期的《文化先锋》发表的《边疆工作与国家政策——读李安宅著〈边疆社会工作〉纪要并代介绍》中认为,《边疆社会工作》的最大特色,在于不是为边疆而论边疆,乃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

《边疆社会工作》共分七章。第一章为“何谓边疆”。在这一章中,阐释了边疆的含义及特征,即“就自然条件而言,边疆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从李安宅对“边疆”的理解中不难看出:作为边疆个性化表达的边疆文化,可以作为边疆社会工作开展的切入点和可利用的优势资源。接着,李安宅介绍了历史的大小循环——赖德懋氏之说、今后的区域分工与公民原则,最后指出了边疆工作的需要,即“边疆需要内地的扶植与发扬,内地需要边疆的充实与洗练”,并指出边疆地区在医学上和防疫工作上都需要内地的支持,实现优势互补。

第二章为“何谓社会工作”。在这一章中,阐释了社会工作的性质、社会工作的类别以及社会工作的趋势。李安宅认为社会工作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传统上人们崇尚过去的东西,但是社会工作是动态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他说,社会工作看到的社会是动态的,并且他认为社会工作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工作。第二,“社会工作不是形式主义的。社会工作不重公